

# 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

下

〔日〕宫崎市定 著  
张学锋 马云超 等 译

日本中国史研究译丛

上海古籍出版社

宫崎市定博士是一位基于良心和自信之上充满视野和气魄的历史学家。初入学林便涉猎广博，“起家”之学为宋史研究。与宋代相关的杂笔、援引，多如散沙，然未经博士之眼者鲜。绝不为引用而引用，所有史料都在为构筑立体的框架而作用。中世纪史研究的重要业绩《九品官人法研究》，通过对数百人物补任的探讨，解开了贵族政治的秘密。人性中恶的一面，有时会留下阴影，因此，历史学家的良心，就是不停留在文献的表面。涉猎广博，就是不踟躇于东洋史的专业范畴。正因为如此，博士独具慧眼，指出欧洲、中国、波斯·伊斯兰这三个世界分别存在着共通的文艺复兴现象。高论激起的波浪，开启了后来者的思路。博士自言：“能够判断研究真正价值的，唯有后来者。”我倒是觉得，博士真正的志向，不仅在于同行后学，也不仅在于像我这样专业相近的非历史学家，而在于向所有的人叙述历史，提出问题供人们思考。博士的文章，就像法国推理小说那样，流利畅达。

——[日]吉川幸次郎

上架建议：中国史

ISBN 978-7-5325-8491-8



9 787532 584918 >

定价：258.00元

易文网：www.ewen.co

# 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 下

日本中国史研究译丛



〔日〕宫崎市定 著 张学锋 马云超等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 / (日) 宫崎市定著; 张学锋, 马云超等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8

(日本中国史研究译丛)

ISBN 978-7-5325-8491-8

I. ①宫… II. ①宫… ②张… ③马… III. ①亚洲—历史—研究 IV. ①K300.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43059 号

日本中国史研究译丛

### 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

(全三册)

[日] 宫崎市定 著

张学锋 马云超等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http://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l@guji.com.cn](mailto:gujil@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http://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90 插页 15 字数 1,290,000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100

ISBN 978-7-5325-8491-8

K·2336 定价: 258.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承印公司调换

## 下卷总目

前言 .....	959
宋代的煤和铁 .....	965
关于中国的铁 .....	986
十字军对东方的影响 .....	1002
中国火葬考 .....	1013
关于二角五爪龙 .....	1028
从元朝统治下的蒙古职官看蒙汉关系 ——再论元朝恢复科举的意义 .....	1038
从洪武到永乐 ——明朝初期政权的性质 .....	1061
难道有两个宋江吗? .....	1080
雍正皇帝 ——中国的独裁君主 .....	1092
《雍正朱批谕旨》解题 ——论其史料价值 .....	1173
清代的胥吏与幕友 ——以雍正朝为中心 .....	1200
雍正时期地方政治的现状 ——《朱批谕旨》与《鹿洲公案》 .....	1226
论雍正时期俸工银扣捐的废止 .....	1247
关于太平天国的性质 .....	1270

马可·波罗的幽灵	
——CATAIO 国的消亡 .....	1299
妙心寺麟祥院藏混一历代国都疆理地图 .....	1307
幕末的攘夷论与开国论	
——佐久间象山遭暗杀的背景 .....	1316
东洋史上的日本 .....	1326
杂纂 .....	1367
跋 .....	1427
译后记 .....	1430

两样东西都很难自我生产。同时,这两样商品又极易成为政府实行专卖以便增加岁收的对象。宋代经济的一大特点是钢铁产量的激增,这是煤炭被广泛使用于冶铸业的结果。《宋代的煤与铁》和《关于中国的铁》两篇,正传递了这样的信息。随着宋朝人口的增长,盐的产量也不断提高。政府对食盐的严格统制,虽然增加了岁收,但却也引发了民间的秘密结社。

地下秘密组织在北宋末年引发了方腊、宋江之乱,在《难道有两个宋江吗?》一文中,我针对《水浒传》的主人公宋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并且我认为,清朝的太平天国也出自相同的系统,《关于太平天国的性质》一文即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考察。接着,舞台转向日本,在《幕末的攘夷论与开国论》中,我对传统观点提出异议,进而得出了日本幕府时代末期社会大变革的根本原因在于萨、长二藩的走私贸易这一结论。

相当于中国宋代的那一段时间,十字军正在西亚酣战。这一事件给西方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也必然会波及东方,我在《十字军对东方的影响》中对此进行了追溯。十字军之后是蒙古军的到来,而在蒙古辽阔的土地上昂首阔步的马可·波罗,则把关于东方的新知识带回了欧洲,欧洲人据此绘制出了东方的地图。当时最难处理的问题莫过于 CATAIO(卡塔儿)王国的位置,他们长期被“马可·波罗留下的亡灵”所困扰。《中国火葬考》也是对西方文明东渐的一个考察。

相对于西亚,日本同样是亚洲历史上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起初若有若无的日本,随着时代的演进而实力大增,终于成为难以动摇的存在。《东洋史上的日本》正是对这一历程所作的概述。

我一直认为,具体事项的研究不能只停留于具体事项本身,所有的研究,都应像竹根那样,无视地上的路标或边界,在深入地下汲取养分的同时,萌发出新的嫩枝。我并不是主张要废除“专业”这一说法,只不过认为专业不应意味着排他性和独占性。因此,专业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应该不断扩展,扩展以后再来回顾自己原先的专业,就能发现许多此前无法发现的东西。所以我认为,扩展必须与深化联系在一起。话虽如此,毕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专业和研究范围都会出现受智力、体力、财力的制约而停滞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目前的亚洲史研究正处于这样一个状态,是进一步

扩展为世界史,还是退一步折回来继续深化自己的专业中国史?我时常被这样的选择困扰。

如果说历史学研究有什么终极理想的话,那无非就是建立世界史的发展体系。但世界史体系的构建,不应基于抽象的思考与空想的定义,而必须要以历史学的具体研究为基础。在建立这种体系的过程中,除研究者的能力问题之外,还有着各种各样的难题。

作为历史学研究的前提,所有的历史事实都不应为个人、民族或国家所私有,这一点常常不被理解。当然,记录、遗物、遗迹和土地都各有所属,我们必须尊重他们的权利。但无论如何,历史事实本身是没有所有者的。任何过去的历史都是人类宝贵的经验,由于历史无法被人为地实践,所以人类既有的共同财产都必须被充分地利用起来。我们研究外国的历史,既不是为了侵占别国的既得利益,也不是仅仅为了这个国家。战时的日本曾试图独占本国的历史,对之做出独特的解释,但这一切都是妄想,只是少数当权者的迷梦而已。本国人未必最了解自己的历史,外国人的理解常常更加准确,这可以说是历史研究中特有的趣味所在。

我认为,所有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都是历史学。换言之,即使各门学科自己没有这样的意识,但却各自承担着世界史研究的一部分。既然如此,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根底,也应该反过来从历史学中寻找。当然,这里所说的历史学并非现实存在的历史学。客观地说,当前的历史学还没有这样的力量。但预想到将来的世界史,根植于其上的人文、社会科学才最能保持活力不是吗?世界史作为历史学的最高理想,不应仅仅交于历史学家之手,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家,都必须把世界史体系的建立作为共同目标而不断努力。

若能撤除历史学中的地域和国境界限,进一步撤去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或者说文学、哲学、史学这样的壁垒才更加合理。不,就连自然科学不也同样可能纳入世界史之中吗?中国的历史学家们把天文学、数学、医学、博物学的知识都写入了历史书籍之中,我们今天能够知晓的各个时代的科学知识,都是从历史书中还原出来的。《本草纲目》的作者李时珍,把超越了时空的药物学知识写入书中,但今天的读者大多会把李时珍的想法理解

为一种历史的事实。自然科学的知识通过历史的时间性,成为构成世界历史不可或缺的史料。

但必须明白的是,世界史的构建永远只是理想,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即使有一位超凡的历史学家撰述了迄今为止所有的世界历史,但只要过去一天,那就难免成为过时之物。历史事实每天都在增加,历史学是永远无法完成的加法。但这又有何不可呢?费用的结算离不开每月一次的小结,统计的数据也无法绝对更新,但自有它的价值。既然一天天地过去,那就一天天地更正,所有的人和事的现象都是如此。大团圆仅见于小说之中,现实的人生是一出永无终结的戏剧。

随着学问的发展,专业化的倾向不可避免,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但不应因此将学问分割、私有,甚至庄园化。所以我不喜欢当今日本学界常常使用的“守备范围”一词。学问领域的私有化,并不是随着研究的需要而自然形成的,而是出于研究者的利己主义,因为不固定范围就没有了权威。

每逢春暖花开,我家的院子里就会有黄莺来访。莺啼声声,甚是风雅。但动物学家告诉我,所有的鸟类都有它的势力范围,黄莺也是来此巡视自己的领地的。所以一旦出现毛色不同的鸟类,黄莺就会发起猛烈的进攻,如果发现对方是更弱的小雀,攻势就会更加猛烈,而一旦屈服于它,终生都将难以抬头。学界也有类似的现象,因此,即便展开讨论,也难有成效。既然沦落为只为决出胜负的游戏,那么中途修改规则也就在所不辞。结果,学问不再是为了真理的学问,而成了只为权威的学问。于是,世间平添了许多权威,研究却变得不再自由,真正的学者恐怕都要走投无路了吧。

1976年春日

书于吉田山麓

莺啼之声不绝于耳

宫崎市定

## 下卷总目

前言 .....	959
宋代的煤和铁 .....	965
关于中国的铁 .....	986
十字军对东方的影响 .....	1002
中国火葬考 .....	1013
关于二角五爪龙 .....	1028
从元朝统治下的蒙古职官看蒙汉关系 ——再论元朝恢复科举的意义 .....	1038
从洪武到永乐 ——明朝初期政权的性质 .....	1061
难道有两个宋江吗? .....	1080
雍正皇帝 ——中国的独裁君主 .....	1092
《雍正朱批谕旨》解题 ——论其史料价值 .....	1173
清代的胥吏与幕友 ——以雍正朝为中心 .....	1200
雍正时期地方政治的现状 ——《朱批谕旨》与《鹿洲公案》 .....	1226
论雍正时期俸工银扣捐的废止 .....	1247
关于太平天国的性质 .....	1270

马可·波罗的幽灵	
——CATAIO 国的消亡 .....	1299
妙心寺麟祥院藏混一历代国都疆理地图 .....	1307
幕末的攘夷论与开国论	
——佐久间象山遭暗杀的背景 .....	1316
东洋史上的日本 .....	1326
杂纂 .....	1367
跋 .....	1427
译后记 .....	1430

# 宋代的煤和铁

## 一 绪 言

内藤湖南博士在杂志《历史与地理》第九卷第一号上发表的《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曾明快断言，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在唐宋之间发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尔来已是 30 余年，依照他的论断，宋代是中国近世文化的确立时期，之后直至清末，中国文化并无多大变化。这样说来，宋代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么，宋代文化在世界历史上有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或者更进一步说，中国历史在世界历史上又具有什么样的意义？这些问题，在内藤博士的启发下不也可以作出解释了吗？抱着这样的想法，我在杂志《史林》第二十五卷第四号和第二十六卷第一号上，以《东方的文艺复兴和西方的文艺复兴》为题，分两期发表了这篇论文，将拙见公之于众。然而，论文发表后，批评之声随即而来，但这些批评多属没有认真阅读我的论文即对我的研究态度进行批评的那一类，所以在这里我要辩解一句，我绝不是单用类推的方法，认为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东方式的文艺复兴，而是觉得宋代的文化实际上对西方的文艺复兴产生了影响，因此对影响产生的过程进行探讨，从而得出了宋代也可以说是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这个结论。我所说的文艺复兴，与“从中世纪向近世转变发展的时期”是同义词。自那篇论文发表以来，至今又过去了十多年，关于这个问题，我一时无暇做出进一步的探讨，只是在《东洋的近世》（收录于本《文集》上卷）一书中，反复论述了同一趣旨。这一次，拙著在世间好像没有惹起什么问题，其实我的观点也几乎没有改变。

最近，京都大学喀喇昆仑山探险队岩村忍教授等组成的人类学班，对

阿富汗、伊朗一带展开了艰辛的调查,带回来了很多考古遗物,其中尤其令人关注的是中国宋代以后的陶瓷器。看到这些遗物,我不禁感慨,这些东西通过“丝绸之路”被带到西方的情景如在眼前。因此,我想利用前两文发表后逐渐积累起来的资料,对这个问题重新加以思考。

通过联结东西方的交通大动脉“丝绸之路”,从古代到隋唐,虽然像丝绸、纸张这样的特殊商品自东向西流以外,但文化的传播基本上是自西向东流的。可是宋元以降,与此前相反,自东向西的文化传播逐渐兴盛了起来,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显然说明了原本文化先进的西亚地区出现了停滞,相反,原本相对滞后的东亚地区文化有了显著的发展,尤其是中国。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引起先进与滞后发生逆转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西亚在三四千年之中,一直位于世界文化的最前列,由于文化的高度发达,这个区域的自然环境当然也被过度地开发和利用,造成的结果必然是自然资源的枯竭。至少在十世纪前后,西亚文化与社会的发展就已经显露出了山穷水尽的迹象。在各种自然资源中,森林资源的枯竭尤其明显,这或许是文化的高度发达所带来的难以避免的命运。这一点在西亚这样的干旱地区,造成的影响尤其严重。耶路撒冷东郊橄榄山上没有了橄榄树,腓尼基背后的黎巴嫩山上也没有了杉树,原本森林资源丰富的西亚,到处濯濯童山,沙化现象日益严重。居民缺乏燃料,政府也很难获得造船的木材。当时,造船材料仰给于遥远的欧洲,但不久以后,欧洲自行制造的船只开始在海面上活跃起来。崛起于亚洲腹地并席卷西亚的游牧民族塞尔柱突厥人称霸西亚的时代,地中海的海洋权完全被意大利人操纵,海洋成了欧洲人的领土,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就是十字军的东征。

燃料不足束缚了人类的生产活动,尤其是金属的冶炼和生产受到了严重的阻碍。西亚的金属加工工艺声名远播,这倒不是西亚地区本身拥有丰富的矿藏,而是致力于利用数量有限的进口原料,实现最大限度的附加值,然而再出口贸易的缘故。到了现在,虽然西亚有着历史悠久的高超技术,但却无法摆脱土地资源的枯竭所造成的困境。

与西亚的停滞状态相比,比重增加非常明显的是欧洲和东亚,尤其是中国。欧洲当时属于封建时代,无数的封建诸侯及中世纪都市处于割据状

态,他们的活动自然有限,尽管如此,11世纪末以来屡次东征的十字军,已经有足够的力量给文化的祖国西亚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位于东亚的中国,五代分裂结束,进入宋代以后,在独裁君主的强力统治下,实现了稳固的统一政治。统一政治的出现绝非偶然,它与当时的社会、文化合为一体,密不可分。历史现象往往互为因果,因此想要明确指出宋代文化的基础是什么,这确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这里想提出来讨论的问题,就是让西亚陷于停滞的燃料问题,而这个问题在中国却得以顺利解决,这一文化发展的事实,可称之为“燃料革命”。更具体一点来说,中国从唐到宋,煤炭的使用逐渐普遍。随着这一新能源的使用,所有的产业都受到了影响,物品的大量生产有了可能。宋代的新文化,就是建立在这种大规模物质生产的基础上的。宋代文化之高,不仅有其精神上的背景,而且只有在丰富的物质生产的背景下才能实现。

## 二 煤炭的普遍使用

早在遥远的汉代,中国人就知道有煤的存在了,但当时的华北一带,有的是山林树木,因此没有必要通过开采煤矿来解决燃料的问题。然而,时间一久,山林资源就会陷于枯竭,因此,寻找新燃料势在必行。煤炭走进人们的生活似乎是从唐朝末年开始的,炼炭技术的发明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宋人康骈所辑的《剧谈录》中,记载了唐末乾符年间(874—879)洛阳豪贵子弟的一则故事。<sup>1</sup>其中谈到这对兄弟受邀前往李使君家去吃饭的事,可是李家用煤烧的饭有烟气,无法下咽。文中这样说:

凡以炭炊饭,先烧令热,谓之炼火,方可入爨,不然犹有烟气。李使君宅炭不经炼,是以难以餐啖。

文中所说的“炭”,显然就是煤。通过加热而去掉烟气的炼炭,不用说就是焦煤。但在这则故事中,李使君是为了接待贵客才用煤烧饭的,因此我们可以想象这时的煤,在洛阳还没有被日常使用。

然而过了一百年左右,在北宋都城开封,煤已经成了一般居民的主要燃料了。关于这一点,看一下南宋初年庄绰所撰《鸡肋编》卷中里的一段记载就会明白:

昔汴都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

既然如此,煤的年消费量一定达到了惊人的数量,换句话说,煤一定已经成为重要的商品。

政府对于煤这一重要商品,与其他矿产不同,其实是将之作为竹木一类的东西来看待的。关于煤的开采,没有任何记录,似乎是自由放任的,只知道把它作为商品运到市场出售的时候就要按例抽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三“大中祥符三年冬十月”条有这样的记载:

并州民鬻石炭者,每驮抽十斤。乙酉,诏除之。

这或许是把煤运进并州城时在城门口抽的税。在煤炭最大的消费城市开封,为了对进城的煤炭进行抽税,特别设置了炭场、税炭场。关于这方面的记载,我所看到最早的一条是《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六“景德三年九月甲子”条:

今京城税炭场,自今抽税,特减十之三。

京城税炭场据载有三处,《宋会要·食货五十四》载:

京西二场,分南、北,南场在大通门外,北场在开远门外。城南一场,在安上门外天马坊。

这三处指的是京西南场、京西北场和城南场。后来又在城南敦教坊新置炭场,合计有四处。虽然有了四处炭场,但却依然称为“三炭场”,其原因或

许是把京西二场当作一个场了。新置炭场之事,见于《宋会要·食货五十四》及《职官二十六》“熙宁三年正月”条,由此可以推测新置炭场或许是熙宁初年设立的。

税炭场的任务,是对运进城门的煤炭进行抽税,并将税金积储起来以充官用。官私对煤炭的需求量都很大,因此,炭场的任务不仅要“对客炭”,即从事煤炭生意的商人进行抽税,还要对地方送上来的“官炭”进行贮存。《宋会要·食货五十四》“熙宁八年六月二十三日”条有这样的记载:

城南并新置炭场,自来受纳石塘河纲炭。

从这条记载来看,当时的煤炭是纲运的一种。

既然煤炭成了居民生活的必需品,政府就不能只顾官煤的问题了,必须考虑都城民用煤的供应。最初只不过是一种赈济性质的措施,把官炭廉价分予贫民,后来变成了常设机构。《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九、《宋会要·食货五十七》“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六日乙巳”条载:

令三司出炭四十万秤,减市直之半,以济贫民。时连日大雪,苦寒,京城鬻炭者,每秤钱二百,故有是命……仍令三司,常贮炭五七十万,如常平仓之制,遇价贵则贱出之。

由此推测,大约到了这个时候才设立了卖炭场。居民们争先恐后奔向卖炭场,有的甚至因拥挤被踩踏而死。朝廷闻后大惊,命都巡检张旻派军校处理此事,赐死者家属缗钱抚恤。这个卖炭场自常设以来,每日于五鼓开场,以“秤”为单位出售。<sup>2</sup>由于“秤”这个单位过大,对贫民来说是件头痛的事,于是天禧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下诏进行改革:

在京卖炭场,一斤以上咸鬻之,仍以辰时为候。

这一记载见于《宋会要·食货五十四》。然而，北宋末年哲宗元符、徽宗崇宁前后，恢复了市易法，煤炭的出售由市易务来掌管，据说是朝廷为了获利才施行的。《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会计”条有这样的记载：

自崇宁以来，言利之臣殆析秋毫……官卖石炭，增二十余场，而天下市易务炭皆官自卖。

《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市易”条元符三年载：

近官鬻石炭，市直遂增。

煤炭的销售既然成为官营事业，可见煤炭必然是相当有利可图的商品。

虽然这么说，但煤炭并没有就此成为政府的专卖商品，民间作燃料用的煤炭，也不完全依靠朝廷的官炭。《宋会要·职官二十七》“大府寺”条载：

政和六年十月十八日，开封府尹王革言：都下石炭，私场之家并无停积，窃虑下流官司阻节，欲望下提举措置石炭事所司，今后沿流官司不得阻节邀拦，及抑勒炭船，多行骚扰，许客人经尚书省陈述。诏依，敢有阻节，以违御笔论。

认识到了任何地方官吏办事总有流弊，所以民间的煤炭供应就一任民间自行办理了。

当时使用的煤炭，其产地又是哪些地方呢？对于这个问题，很遗憾，目前还不是非常清楚。首先，煤炭的最大消费地都城开封的用煤是从什么地方运过来的呢？

旧三场的位置既然都偏在都城的西部，那么便可推测煤的产地在西边。京西南场在大通门外，大通门是黄河支流汴水流过开封城西墙处的城门。这个城门之北有开远门，门外即京西北场。设置在都城西侧的税炭